

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时代征候*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

左 杨

【提 要】回顾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涉及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对古代传统理论资源的继承与延伸,也包含接纳西方理论资源时的本土立场和表述方式,还关乎对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新时期”文艺的勾勒与定位,更揭示了当代文艺理论、当代美学逐渐丧失其社会实践性的紧迫状态。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可行路径,涉及理论转场、文艺理论的学科交叉以及新媒介文艺的理论探索等内容。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下,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需要我们合理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踏实中国立场;需要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使之本土化、当下化,富有时代性及社会实践性。

【关键词】本土立场 社会实践性 理论转场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1-0084-05

2016年10月22~23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二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共同讨论“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问题。会议共收到论文171篇。

10月22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

誉主任曾繁仁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赵宪章教授相继致辞。与会代表就当下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困境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对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未来及出路开出了有效的“药方”。会议期间,学者分为四组,围绕百年中国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百年中国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百年中国文艺理论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中国文艺理论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 本文的写作受到张政文教授及赵宪章教授的帮助和启发,特此致谢。

一、回顾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

回顾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涉及中国文艺理论建构对古代传统理论资源的继承与延伸，也包含接纳西方理论资源时的本土立场和表述方式，还关乎对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新时期”文艺的勾勒与定位，更揭示了当代文艺理论、当代美学逐渐丧失其社会实践性的紧迫状态。这是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中国文艺理论的本土立场

曾繁仁教授在开幕式致辞时指出，结合现实回顾我国文艺理论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呈现、有分析地继承，应该成为当代学人出发的前提。通过对1981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一届年会及其后在昆明召开的规划会两次会议的回顾，曾繁仁教授进一步强调了有预见性地做好文献资料的处理工作、呈现各历史时期复杂多样的学术生态面貌的重要性。他以《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的撰写为切入点，回顾了我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揭示了促进中国五千年美育发展的儒释道互补、阴阳相生、中外对话融通、审美与艺术统一等关键性因素的内涵与意蕴。

赵宪章教授在致辞时以“中西”关系为中心，阐述了进入文学理论的“姿势”问题。他认为从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言开始，百余年来关于“中西”关系的争论连绵不绝，其中出现了许多新提法，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会通”、“中西合璧”、“失语症”等等。王国维对“中西”关系的透彻理解并不在他的表述中，而是体现在他的具体作为本身，体现在他对中国戏曲、小说、词话等方面的研究中。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回顾，赵宪章教授提出，当今学术研究中关于“中西”关系并不缺少层层翻新的说法，而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做法。研究西学的前提，是踏实中国立场、质疑中国问题、使用中国表述方式。中国立场、中国问题、中国表述方式只能存放在中国的文献中。高楠教授也谈及文艺理论不能自断传统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百年文学理论两次断裂的理论思考，他认为两次断裂的理论启示在于传统的断根性否定是族体与国体的理论断根式否定，由此造成的理论自体性断裂又是西论得以律中的理论原因。曾军教授回顾

了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三种范式：作为“异国情调”的中国问题，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谋求“多元共生”的中国问题。其中，多元共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日渐明晰的学术立场和态度。他认为，当代中国文论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给西方学者以异国情调猎奇感的古代美学和思想，也不能停留在对西方文论曲解和误读中国问题的东方主义的批判上，更重要的是在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中，在交往对话和思想碰撞中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新形态。

（二）当代文艺创作成就与理论实践的定位

鲁枢元教授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回顾，并提出“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历史”的论断。他将“新时期文学”的内涵归纳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向世界开放、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各种体裁的文学艺术对当下的政治经济生活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等五个方面。他认为进入1990年代以后“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思潮已经开始消退，而进入21世纪后“新时期文学”的几点内涵逐渐淡化、转移、消失。尽管作为一笔历史遗产，仍有必要被探讨下去，但就其本质来讲，“新时期文学”已成为历史。朱国华教授亦认为，“新时期”已不足以命名当下的文学存在，这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张政文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谈到，20世纪末以来，文艺理论、美学以一种非文艺理论、非美学的方式对我们共同的审美经验、文艺实践进行扫荡。其结果是当代文艺理论及美学疏离了中国审美立场，对我们活生生的文艺生活失聪、哑语。美学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普遍性、最富时代性、最有能指性的思想理论交往的公共话语，矮化为少数专家学者的“理论”独白。^① 而究其原因，张政文教授指出，一方面，近些年文艺理论、美学撤离了火热的文艺现实生活，对大量鲜活的内容视而不见。比如网络文学至今也没有一套用简洁的话语方式表达的、能够说服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传统和美学传统自断血脉，同时对西方理论的研

^① 张政文：《理论转场与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构建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究还远远不够。因而西方美学话语没有中国化、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没有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主流文艺理论没有当下化。^①

会议中同样关注到文艺理论实践性问题的还有陈晓明教授。当代文学在1990年代之后转向了传统乡土文学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现了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一大批知名作家。这也引起了此次参会专家的重视。陈晓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在地性”的理论意义。他把握住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民间乡土的以及现代主义的，进而强调了能否发掘出汉语文学的价值对当今的文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观念史的理论，文学理论已失去了实践的品格，中国的文学理论也许还未真正开始。而回到汉语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的阅读，一定能找到新的展开的可能性。

二、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可行路径

(一) 理论转场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正面临着实践性逐渐弱化的危机，因而“理论转场”概念的提出，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共鸣。张政文教授指出，文艺理论要重新回到生活中去、回到文学经验中去，就需要将其他场域的理论真正转化为我们当代可用的美学及文艺理论，也就是“理论转场”。构建当代中国美学及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最重要的路径就是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并在理论转场过程中使之本土化、当下化，使之成为面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置身当代中国审美生活、言说与表达当代中国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并具有广泛话语影响力与巨大社会参与度的当代美学及文艺理论话语体系。^②

冯毓云教授也重视构建中国话语的文艺理论的“转场”问题。她认为，建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艺理论离不开如何对待西方文论、中国传统文论和当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现实三个维度。而对待西方的学术资源，一是要拿来，二是要鉴别，三是要与中国的实践结合。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高楠教授提出，目前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没有认真对待“转场”问题，而是用普适性对待差异性。王德胜教授则从重建美学

与生活的现实关系问题出发，论及理论的“转场”。

(二) 文艺理论的学科交叉

跨学科对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990年代之后所谓“扩容”、“转向”等口号的提出，它对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丰富性提供了支持。文艺理论研究的跨学科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赵宪章教授对当下文艺理论走向无边无际、文学本身是否在场已无关紧要等现象做出了否定评价，认为这种跳到文学之外的理论显然不是跨学科的本意。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将“从文学理论到理论”作为普遍性方法肆意放大，显然是一种严重误导，对我国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理论贻害无穷。他强调，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不是跨出文学而已，也不是简单地跨到另外一个学科来看待文学，而是高难度的学术转型动作——难就难在它需要超过自己原有的知识域和方法论，需要始终面对一个陌生的、未知的世界，需要对本来的熟门熟路“关门”和“短路”。

李庆本教授指出，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项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它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依归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来讲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

冯毓云教授认为，文艺理论的回归，是在文化的大视野关照下，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对性与决定性、解构与建构、过程与结果相融合，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非常可喜的是，以童庆炳先生为首的文化诗学学派，早在1990年代，就洞悉了西方文论这种跨学科性与文学性的分道扬镳的双重性，立足于我国的具体语境，针对性地提出了文化诗学，建构了在以坚守文学性的学术立

^① 张政文：《理论转场与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构建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② 张政文：《理论转场与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构建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场前提下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跨学科性与文学性的互通、互为、互利、互融的中国式的文学理论话语。鲁枢元教授谈及“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说到，中国新时期的跨学科研究在许多领域至今也还是比较粗糙的、生涩的、脆弱的。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乃至有待于今后数代人的持续努力。

（三）新媒介文艺的理论探索

进入 21 世纪以来，数字媒体已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在全民数字化阅读的“读网”时代，如何认识数字时代媒体阅读的特点、如何对新媒介文学成就进行理论批评，是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要论题。

胡亚敏教授对数字时代媒体阅读的特点及所带来的挑战有深入剖析。她将阅读描述成三个阶段，即读文时代、读图时代、全民数字化阅读的读网时代。数字时代媒体阅读具有便携性和全民性的特点，既不受空间制约也能使阅读者都能平等享受。但同时它也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一是碎片化。二是遗忘，包含信息泛滥造成的遗忘，以及信息知识无需记忆造成的遗忘。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引擎日益使记忆沦为不必要。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胡亚敏教授提出，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科学技术时所持的历史的辩证的立场和观点为研究数字媒体时代的阅读提供了理论出发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高科技时代人的异化问题作了独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看到数字媒体带来的革命性的巨大变化，也需要充分认识包括数字媒体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而互联网掌握在谁的手里，是其意识形态性最核心的部分。其次，数字时代的媒体阅读需要读者的自主性，读者应具备选择能力和批评能力。阅读不仅仅是为获取知识，关键在于对话。再次，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式应从关系性、对象性的角度出发，而非从因果方式进行思考。

朱国华教授亦针对数字时代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引用本雅明的理论提出两种应对方式，即无意识状态重建经验与以文学自杀的方式来捍卫文学的经验性这两种方式。欧阳友权教授对网络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展开思考，认为网络文学研究者需要点击网站、阅读作品，下足新批评派所倡导

的细读工夫，了解和把握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作品形态、传播载体和接受方式，以及功能结构与意义蕴含等。网络学人唯有切入现场、明察深思，做一个网络文学的“局内人”，才有可能赢得对它有效言说的话语权，才不致于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成为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或隔空取物之论。

结语

除了以上讨论的议题外，部分学者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综合性”视角、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中国古代文论中意境与意象的关系等话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大会的学术交流拓宽了文艺理论建设的研究视野。会议通过回顾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以及探寻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可行路径，给中国文艺理论的良性发展筑牢了重要基础，为今后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视角。

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下，面对“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的复杂局面，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①首先，从胡亚敏教授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要求我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学术问题。即便是面对快速崛起、难以把捉的网络文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与观点也同样有助于厘清其根本属性。其次，从赵宪章教授的发言中能够发现，“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需要我们合理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踏实中国立场。完全失去西方文艺理论的背景，在继承创新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资源时则难出新意。以中国立场、使用中国表述方式来质疑中国问题，再借助西方文艺理论的合理资源，有助于寻找到新颖又颇具价值的学术视角。再次，从张政文教授的发言中可以体会到，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需要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使之本土化、当下化，富有时代性及社会实践性。快速恢复和建立主流文艺理论的社会实践功能，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及话语体系的迫切要求。

本次会议的诸多讨论也给我们带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一是如何扩充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从而使中国的文艺理论及其话语建构真正丰满、活跃起来。一方面，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文本，图像、音乐亦应被列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插图文学研究、中国传统诗歌的吟诵研究，都应被纳入到文艺理论研究的关注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文艺理论研讨的参与者，还应当包括当代作家、甚至新媒体创作者。将跨学科甚至“跨行业”的方式合理地引入文艺理论的研究之中，给予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对话和碰撞的机会，是加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当下性与实

践性的可行方案。二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当下化问题，既注重中国传统文论本体研究的具体性质，又充分发挥传统理论资源的当下实践功能；既认识二者的区别，又发掘彼此的关联。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本体研究，不可脱离历史还原的研究宗旨，认识传统文化理论的立体化与复杂化、尽量客观还原其历史原貌是该类研究的根本任务。而发挥传统理论资源的当下实践功能，则可以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提炼及转化，突出符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体研究越深刻丰富，越能够为当代理论实践提供充足的思想资源。繁荣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的本体研究，是促进中国传统理论转场、使之有效参与到当代文艺实践活动中去的客观前提。如此才能体现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发展和光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辑

责任编辑：周勤勤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 Summary of th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Symposium on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Zuo Yang

Abstract: The review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heory,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theory, and the sketching and locating of “new period”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reveals the urgent situation that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re losing social practicality. Theory transi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by new media all contribute to a burgeoning discours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iscourse system demands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 and the rational treat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s. Meanwhile, it requires our firm adherence to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our conscious transition of theories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so as to make them native, present and practical

Keywords: native perspective; social practicality; theory transi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